

一定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

裴安平

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其中历史性地提出了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然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呢？恐怕不仅仅因为“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已成为了“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而是另有发人深省的原因！

早在1934年的《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¹一文中，梁思成等先生就指出“修理古物之原则……均宜仍旧，不事更新。其新补梁、柱、椽、檩、雀替、门窗、天花板等，所绘彩画，俱应仿古，使其与旧有者一致。”这说明从那时起，在文物与古迹的修复中就已经开始拥有了“整旧如旧”的思想了，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时也说明今天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文物与古迹以外表为主的维修范围，说明当代的“文物资源”存在刻不容缓的需要“维护……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一般而言，“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不仅包括外表的形态、颜色、纹饰等内容，而且还包括关于内在历史意义的复原和认识。

根据实情与现状，近几十年来在大量精彩不断的考古新发现的掩护下，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认真履行“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责任和义务，没有认真复原历史研究历史；反而随意拔高了一批“文物资源”原本的历史意义，制造了一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长江流域第一、黄河流域第一的“文物资源”，并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历史真实性”。

为此，中国考古学必须回到“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正轨上来，并同步注意和解决以下六个与忽视“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要端正考古学的目的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一带一路”的不断延伸；又随着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目的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往的考古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冷僻分支，也是大历史学中的一个冷僻分支，考古学的目的单纯只是用实物资料来复原历史研究历史。但是，现代考古学与以往完全不同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得到了社会的空前重视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宣传、弘扬和保护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并为地方文化事业和旅游提供服务，从而使考古学的社会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此外，考古发现还明显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了，与项目和经费挂钩了，与考古工作者个人的名利挂钩了，考古专业也由以前的冷僻专业变成了公共的热门专业，变成了电视明星专业。对此，考古人欢欣鼓舞，专业自豪感大涨，结果带出二个颠覆性的变化。

第一，急功近利，发现与研究的地位倒转。

以前考古发现主要是为研究服务，为研究提供资料和证据；但今天，由于急功近利，研究的地位下降了，研究开始为发现服务，为提升新发现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服务。于是，一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长江流域第一、黄河流域第一的新发现很快就在各地出现了。其中，“河洛古国”与浙江上山文化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与“彩陶文化”的诞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²。

¹ 梁思成等：《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年。

² 沈爱群：《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拥有2项“世界第一”的“上山文化”有资格申遗》，杭州：浙江新闻客户端，2020年11月12日，<https://zj.zjol.com.cn/news/1561247.html>；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裴安平：《质疑浙江上山文化最早年代的认识与认识方法》、《上山文化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河洛古国”是真的吗？》，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第二，默默无闻的研究被彻底懈怠了。

有一个考古人 2001 年就发现了一个新考古学文化，但此后 20 年他却从未在科学刊物上正式发表过一篇用器物类型学专门论述这个文化年代问题的论文；即使 2016 年在发掘报告中关于该文化年代的简要论述，也完全不顾事实编造了许多假的证据³。然而，在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抬举下他却弄假成真了，还成了省文化系统的“模范人物”⁴。这说明只重田野发现而懈怠室内研究已成学界的普遍现象，即使专家和学者也不研究了。

显然，以上现象不仅反映考古学的目的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说明考古学的基础研究也日趋轻浮和衰落。因此，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首先就必须端正考古学的目的。

二、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就是从未创造历史

2010 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一文中，王巍、赵辉二位先生共同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各文化的区域特色各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⁵。

在这里“考古学文化”已变成了一种人类的社会组织，一种历史的实体与载体；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甚至还可以带领自己的属民一起来搞文明和国家起源？！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

不过，以上认识明显夸大了考古学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第一，考古学文化只是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其本质是物质文化遗存。

第二，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人类的血缘组织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一方面，考古学文化分布地域广阔，而血缘组织分布地域狭小；另一方面，考古学文化全是遗迹遗物，而人类组织全是人；再一方面，人类组织的基础以血缘为纽带，而考古学文化则以地缘为纽带。

第三，考古学文化完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留物，虽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历史和变迁，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时空框架，但这一切都只涉及历史的表面现象，根本没有触及到人类历史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即社会的组织方式、特点、性质与变迁。

事实上，创造人类历史的是人，是人类组织，完全与考古学文化无关。

正因此，“考古学文化”既不是人类的组织，也不是历史的载体和平台，更不会自主创造历史；考古学对历史的研究，对“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不能仅仅只停留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而是要研究隐藏在物质遗存背后人的组织、活动与历史。

三、碳十四测年数据不是“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据

现代田野考古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拥有考古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二大方法论基础和支柱。因此，无论任何时候它们都是确定遗迹遗物以及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主要依据。至于碳十四测年法，作为一种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领域中运用，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同时期的测试结果也会与时俱进，从而使绝对年代的测试与研究充满了相对的意义。正因此，碳十四测年数据只能作为考古学遗迹遗物和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认识的一种参考，绝对不能作为考古遗迹遗物和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认识的依据，更不能成为“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依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 20 多年来碳十四测年法在考古中的地位开始飙升。

第一，碳十四测年法已开始为古文明定“坐标”⁶。

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浦江上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 272 页。

⁴ 郑维维：《蒋乐平：半生耕耘“新石器时代文化”寻浙浙江史前文明》，杭州网/热点专题/2019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最美文物守望者，2019 年 12 月 9 日；

骆依婷：《蒋乐平：“上山考古”第一人》，浙江：《诸暨日报》，2021 年 5 月 11 日。

⁵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北京：《光明日报》，2010 年 2 月 23 日，第 12 版。

⁶ 李禾：《碳十四等测年法为古文明定“坐标”》，北京：《科技日报》，2013 年 1 月 5 日，第 3 版。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它说明碳十四测年法越来越进步，也越来越受到考古研究人员的重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传统类型学在遗迹遗物和考古学文化年代与早晚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类型学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只有基础夯实了，才有考古学的科学性。否则，考古学的科学性将不复存在。今天，之所以会出现用碳十四测年数据取代类型学研究的趋势，正是考古学基础研究日趋轻浮、衰退的标志。浙江上山文化之所以在陶器明显晚于湖南彭头山文化⁷的时候还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忽视了最基本的类型学的研究而偏信了碳十四的年代数据。发掘者之所以近 20 年来一篇认真进行该文化有关类型学问题研究的论文都没有，就是在等待并向碳十四测年数据靠拢。

第二，碳十四数据有越测越早的趋势。

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碳十四实验室表现得比较明显。

例证一：湖南皂市下层文化与浙江跨湖桥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这二个文化“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⁸，更多的显示可能同时，因为皂市下层文化对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都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恰好相反，北大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跨湖桥文化比皂市文化整整早了一千多年。其中，21 世纪测的跨湖桥文化第一期最早距今 8200—7800 年⁹，而 20 世纪测的皂市下层文化最早距今 7200—6920 年¹⁰。

例证二：湖南皂市下层文化与江苏顺山集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这二个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充分显示可能同时。然而，恰好相反，21 世纪北大测的碳十四测年数据顺山集文化比皂市下层文化也整整早了一千多年，即顺山集文化距今约 8500—8000 年¹¹。

例证三：湖南彭头山文化与浙江上山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彭头山文化明显年代偏早。然而，恰好相反，北大 21 世纪测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上山文化又比 20 世纪彭头山文化整整早了一千多年。其中，彭头山文化距今约 8385—7210，不仅晚于上山文化，而且上山文化最早第一期的上限还超过了距今 1 万年¹²。

例证四：湖北宜都城背溪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城背溪南区 T6、T7③层明显早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但是，20 世纪城背溪 T6③兽骨测年仅为 6800±80 年，达曼表校正为 7420±110 年；而 21 世纪桥头遗址中期 T1 ③层测年为 7985±50、8090±45，校正距今 9000 多年¹³，整整早了 1500 多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专家的论述，这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引起的，而且还显示随着这种进步有关年代数据也会越来越早越来越准确可靠。然而，这种进步实际一点也不科学。一方面，它并没有提供一张必要的校正表，并通过它显示以往技术不太先进时所测数据与现代先进技术所测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眼见现代先进技术所测数据地位片面增高的时候无动于衷，从而助长了轻视基础研究而只重测年数据的不良学风，不仅年代越测越早，还越来越人性化，为借碳十四数据抬高出土遗迹遗物历史价值提供了貌似科学地支持。

正因此，现代碳十四测年数据不是在为“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补台，而是在拆台。不能再继续了。

⁷ 裴安平：《质疑浙江上山文化最早年代的认识与认识方法》；

《上山文化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⁸ 焦天龙：《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

¹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北京：《考古学报》，1993 年，第 2 期。

¹¹ 南京博物院等：《顺山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

¹² 蒋乐平：《综述》，《上山文化：发现与记述》，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6 年。

¹³ 林森等：《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距今 9000 年左右上山文化环壕-台地聚落》，
<https://new.qq.com/omn/20190812/20190812A0R7TN00.html>

四、要坚决抵制欧美的不良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以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为代表,显示那时欧美曾流行过“马克思主义考古学”¹⁴。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理论划清界限,西方欧美的人类学、考古学纷纷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并启用了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概念与思想来认识和诠释史前血缘社会,从而催生了“四大”架空和虚化史前社会原貌的“先进”理论。第一种就是将旧石器时代遗址之间的关系都视为“功能分区”¹⁵,第二种就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关系都视为“区域聚落形态”¹⁶,第三种就是将“酋邦”视为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¹⁷,第四种就是将史前有“四级聚落”的地区都视为有国家存在¹⁸。

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功能分区”,中国考古表明人类社会各种生产生活设施以遗址为单位独立“功能分区”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一方面,所有史前早中期人类居住遗址内部的各种生产生活功能区,如居住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从未分开成为一个个独立的遗址;另一方面,那种以遗址为单位独立的“功能分区”,全部都是史前晚期社会一体化文明化的结果,浙江余杭瑶山祭坛、塘山玉器作坊遗址即是¹⁹。

关于“区域聚落形态”,中国考古表明在国家出现之前,整个史前社会都是血缘社会,到处都是小型的血缘组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地缘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和“社区”、“社群”。

关于“酋邦”,中国考古表明一方面在“酋邦”之前中国就根本没有出现过以孤独的“游群”为主要社会组织时代,另一方面史前晚期中国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以地缘化“酋邦”为代表的过渡到国家社会的历史阶段²⁰,再一方面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与其它出土文献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酋邦”的记载。

关于史前“四级聚落”即国家的理论,王震中先生就曾指出:“一是划分和衡量史前聚落等级的标准受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所划分出的等级是相对的;二是所谓国家的产生是由四级聚落等级组成和其上有三级决策等级来表示的说法,过于绝对化和教条化,似与中国上古时期即虞、夏、商、周时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三是作为区分酋邦与国家的衡量标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某个聚落群中聚落等级究竟是由三级还是四级构成……”²¹。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理论都被中国考古学无遮无拦地引进了。

其中,王巍先生“出于为中心聚落中的显贵们服务的需要……卫星聚落一般都位于中心聚落的周围……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点”²²的观点就是“区域聚落形态”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此外,严文明先生也曾说良渚文化是“酋邦”²³,李伯谦先生也说屈家岭文化是“酋邦”²⁴。

然而,以上欧美的“四大”理论都是不良理论,一是与中国的考古实际完全不符,一点“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都没有;二是不会在中国有助于史前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三是也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¹⁴ [加]布鲁斯·G. 特里格著 何传坤/陈淳译:《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¹⁵ [英]Leakey, M.D.1971. *Olduvai Gorge: excavations in Beds 1 and 2. 1961~19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3、43 页。

¹⁶ [美]史蒂芬·科瓦勒斯基著,沈辛成译,陈淳校:《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南昌:《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

¹⁷ 陈淳:《酋邦的演化》,南昌:《南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

¹⁸ [美]史蒂芬·科瓦勒斯基著,沈辛成译,陈淳校:《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南昌:《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

¹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²⁰ 裴安平:《中国考古与酋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²¹ 王震中:《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北京:《历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

²²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北京:《文物》,2006 年,第 5 期。

²³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5 页。

²⁴ 李伯谦:《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新田文化与和谐思想论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6 页。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考古已经走出了国门，并成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先行者。然而，那些“先行者”许多在思想理论方面都携带着欧美的不良理论；如此，必将出现中国出资替欧美推广不良理论的尴尬局面。

正因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还具有国际意义；而且要在中国和“一带一路”上的世界各国都“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就必须在国内从上到下都坚决抵制欧美的不良理论。

五、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所以出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²⁵。此外，恩格斯的这句话也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建立是基于“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崛起²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考古学最基本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苏秉琦先生所倡导的“重建中国史前史”²⁷，也为中国考古学在“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今天的中国考古学，不仅将摩尔根置之度外，对马克思主义也全面的实用化。

其一，只消极“继承”不主动发展。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不仅年代早，1884年，也就是近140年以前；而且当时无论历史资料还是民族学资料都很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考古资料就完全等于零，因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就不免阶段性地域性成果的意义，并给今天的继续发展留下了余地。

与此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史前和古代遗址被发掘出来，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历史鲜明的自身特点，还为人们解放思想，深入研究，自觉地继承，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中国考古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主要是通过简单地“贴标签”和抄袭等方式消极的“继承”，而从不谈主动的发展。这除了本身的自觉性不够以外，还因为主动发展将完全关闭了引进西方欧美“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大门。

其二，只选简单有用的论述不选复杂不好用的概念。

关于“文明”概念的选择就是典型一例。

关于“文明”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二种不同的表达。1844年，在《英国现状·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²⁸；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又指出：“国家就是文明社会的概括”²⁹。

对此，中国考古学只选择了后一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有三个方便使用之处。一是便于改造本土化，可将国家视为文明，文明视为国家；二是求证简单，只要求证国家起源了就同时也证明文明也起源了，反之亦然；三是极大地缩短了求证的过程与时间。

其三，对大量中国考古发现置若罔闻，全力向西方欧美“先进”理论与方法靠拢。

事实表明，中国考古早就为论证文明“是一种社会品质”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并证明在距今8—5千年期间社会发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变化³⁰，文明不仅先于国家起源了，而且文明化的地域也比国家起源的地域要广大很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个人与个人、聚落与

²⁵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²⁶ 赵宾福：《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²⁷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北京：《考古》，1991年，第12期。

²⁸ 恩格斯：《英国现状·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6页。

²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³⁰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北京：《考古》，1991年，第12期；

《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苏秉琦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19页；

聚落、聚落群与群之间的等级和地位分化并出现了主从关系；有的人就有玉器，有的聚落就可以住在明显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或城里³¹。

然而，为了维护西方欧美“先进”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维护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中国考古学却置大量本土考古发现于不顾，并全力向西方欧美“先进”理论与方法靠拢。

显然，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来之所以误入歧途，最关键就在于没有“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没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思想。

因此，只有在“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考古学的正道，才能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³²。

六、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是“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必然选择

“群聚”一直就是人类的居住与生活方式。

根据前苏联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的调查³³，中国詹承绪、严汝娴、宋兆霖等云南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的调查³⁴，韩军学先生云南佤族的调查³⁵，童恩正关于非洲尼日利亚蒂夫人（Tiv）社会组织的简介³⁶，尤其是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³⁷，充分证明在历史时期人类以地缘为纽带以民族为单位群聚以前，史前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并普遍存在以血缘为纽带，以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群聚现象。

此外，中国考古还证明，地缘社会最小的群聚单位是村落，而血缘社会最小的群聚单位则是聚氏族而居的聚落。与此同时，中国考古还进一步证明，史前聚落的群聚形态不仅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还是史前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平台³⁸。

距今约3百万—8千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

由于地广人稀，人类的食物全部都是自然食物，所以当时社会发展的矛盾主要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居住地及其组织的群聚形态都以血缘为基础，部落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还是聚落群聚的组织单位。又由于地广人稀，各聚落相互独立平等，所以群体的分布比较稀疏。

距今约8—6千年，新石器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

由于人口增加和农业的发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变为人与人、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居住地及其组织的群聚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力开始成为血缘之上的新型组织纽带。在实力的基础上，聚落之间一方面出现了地位等级化，出现了主从关系，有实力的聚落成为了部落的核心；另一方面，聚落群及部落首先开始基于实力一体化，变各成员相互独立平等为统一领导和管理。与此同时，部落内的核心聚落开始出现在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和濠沟以内，出现了为高等级人士服务的特殊手工业和为大众服务的普通手工业的分工。

距今约6.5—5千年，新石器晚期中段。

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聚落群的一体化再次升级，部落内的核心聚落由环境（濠）聚落升级为城址³⁹。

距今约5—4.5千年，新石器晚期晚段，

为了应对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聚落组织在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始大型化和分布紧凑化，

³¹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5—352页。

³²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北京：《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第1版。

³³ C. A. 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³⁴ 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³⁵ 韩军学：《佤族村寨与佤族传统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37页。

³⁶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³⁷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³⁸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³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出现了抱团相聚的新式的一体化聚落群团，以往关系松散的临时性部落联盟开始成为永久性部落联盟，有实力的聚落群开始成为永久性部落联盟的核心聚落群⁴⁰。与此同时，群团内出现了贵族，出现了礼器，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出现了大城套小城的城址样式。

距今 4.5—4 千年，新石器晚期末段。

由于社会矛盾进入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所以社会同时崛起了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新型一体化超大型聚落组织，有实力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开始成为这些组织的核心³⁹，整个社会也开始由血缘向地缘过渡。与此同时，还新出现了整个聚落群团或聚落集团集体居住的大型城址。

显然，回眸中国的史前史不难发现，聚落的群聚形态无论怎么变化都并非置身于历史之外的怪物，而是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产物，充满着“历史真实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就跟随欧美考古学，一方面认为聚落的分布就是一盘散沙，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区域落形态”，有“中心聚落”和“卫星聚落”。但是，中国考古早已表明欧美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基于血缘的氏族社会，就有基于血缘的聚落群聚形态，聚落群聚形态本质上就是血缘社会血缘组织形态的物化结果和反映。

因此，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就必需维护“聚落群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而维护“聚落群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实际又是“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必然选择。

结束语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要么继续融入欧美的认识与理论体系，并用地缘社会学的思想和观念继续浮夸和炫耀史前社会遗迹遗物的历史特点与性质，继续制造更多假的“世界第一”、“中国第一”、“长江流域第一”、“黄河流域第一”；要么深刻领会，并以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为突破口，实事求是地“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的血缘社会史。

事实上，基于中国考古的已有发现与资料，“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并不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关键在于现代考古人的追求与思想意识。

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时代正在呼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也正在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希望“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能成为中国考古学重回正轨的开端。

作者信息

姓名：裴安平

性别：男

年龄：68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已退休

职务：教授

身份证号：430105195310041036

家庭住址：南京市清凉门大街 68 号金信花园 4-10-702 室

家庭电话：025-86307764

手机：13813928912

邮箱：peianping1953@126.com

⁴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武汉：《江汉考古》，2008 年，第 2 期。

³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武汉：《江汉考古》，2009 年，第 1 期。

